※「戴璉璋教授的學術研究」專輯 ※

戴璉璋先生的魏晉玄學研究

謝大寧*

今天非常榮幸,也很忐忑能夠有機會來報告戴老師在魏晉玄學研究方面的貢獻。在報告之初,請容我先說點題外話。在牟門弟子對牟宗三先生學問的繼承上,有關玄學的研究也許算不上是個顯學,儘管大家都讀過《才性與玄理》這部書,但真正以此為專業的實在很少,戴老師無疑是佼佼者。不過我始終認為,魏晉玄學其實和戴老師的性情是不協調的,他之進入玄學,多半還是因為《易經》的緣故。戴老師在《易經》研究方面的投入,是大家都知道的。而自孔穎達取王弼的《周易注》為正義,王弼在《易》學上的地位便無可搖撼。戴老師大約因此而轉到王弼身上,從而在牟先生的引導下,而進入了玄學的核心,也就是戴老師經常說的,玄理與玄智的問題。戴老師當然在他的著作中,曾經依此全面處理了玄學的問題,但因為老師進入玄學的因緣,所以他著力最深,應該說也是貢獻最大的,大概就是在連結王弼的《易》學與玄學之間的關係上吧!所以我今天的報告,也將聚焦在這樣一個論題上。雖然這樣一個論點有點狹窄與單一,但我認為對陳述戴老師在魏晉玄學發展上的地位,應該還是有點睛之效果的。

要勾勒這個問題,我不得不從一個重要的背景談起。談魏晉玄學,由於一個已經流傳一千多年的常識性觀點,使得每個研究者都不得不從王弼談起。這個常識性觀點認為,魏晉玄學就是道家思想的簡單復興,而啟動這個復興的關鍵人物就是王弼,王弼通過他的《老子注》與《周易注》這兩本經典性的註解帶起了這樣一種學術新風氣。這個常識性觀點似乎是強大到不容挑戰的。一百年前,湯用彤先生第一次開始嘗試將魏晉玄學建構為現代學科時,他顯然也遵循了這個基本觀點。因為現代學科有系統的邏輯性要求,它不像傳統學術那般寬鬆,所以湯先生的整個玄學系

^{*} 謝大寧,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授。

統,也就是根據王弼著作所提供的基本概念,構建了一套基本邏輯。按照湯先生的想法,玄學與兩漢思想最基本的差別,就在於兩漢思想乃是一套宇宙論,而玄學則是一套本體論,這套本體論的基本理論,是王弼根據老子「有與無」這兩個概念所建立的。於是「有無、體用、本末」等王弼在《老子注》與《周易注》中不斷出現的概念,就成了湯先生最重要的素材」。同時他也是以王弼為軸心,從歷史詮釋的角度,構建了一套從東漢末就開始的「道家復興運動」的說法,並通過清談等方式,開啟了整個魏晉的玄學²。這其中唯一一個可能不是王弼開啟的重要論題,大概就是「自然與名教」之爭。但是湯先生自然也有一種詮釋方式,把這個命題和王弼所開發的有無命題關聯上,從而可以根據王弼的思想,規範整套魏晉玄學的系統³。

湯先生這套系統的影響無疑是極為巨大的。應該這麼說,湯先生跟馮友蘭先生是同時代的人物,但馮先生對中國哲學的詮釋早已經是歷史陳跡,可是湯先生的玄學系統到今天,依然具有豐沛的生命力。這當然是很奇特的事。這究竟是湯先生太厲害了呢?還是後學者實在有點不爭氣呢?這麼多年來,對湯先生提出系統性質疑的,大概只有牟先生吧!牟先生的玄學詮釋是非常特別的,他基本沒有更動湯先生的整體話語體系,他只是質疑了一個關鍵性的詮釋,也就是他反對湯先生把「有、無」當成是本體論的概念,並由之展開了他一套有關「境界形態形上學」的說法。「有」與「無」這兩個概念必須由主體的實踐意義上來理解,其核心是在「無」這個概念上。「無」的意義乃是一種主體實踐上的無執無為,也由此構成了一套玄學的「玄理」,「無」則成了這套玄理所表現的「玄智」4。牟先生這套詮釋的改變,當然改變了湯先生的系統架構。如果按照湯先生的說法,「有」與「無」只是某種形上學中的存有論式的知識概念,並沒有任何實踐上的意義。中國哲學中是否存在著這樣的形上學系統,姑且不論,但如果順著湯先生的詮釋,玄學就會成為這樣的知識系統,則是無疑的。因此,牟先生的詮釋當然對湯先生的詮釋構成了顛覆性的效果。

牟先生這樣的詮釋架構就一個關鍵層面說,顯然是比湯先生的系統更有說服

¹ 湯用形:〈言意之辨〉,《魏晉玄學論稿》,收入魯迅等:《魏晉思想·乙編三種》(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頁23-45。

² 湯用彤:〈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同前註,頁 87-106。

³ 湯用彤:〈王弼聖人有情義釋〉,同前註,頁75-86。

⁴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102-103、141-143。

力的,也就是牟先生的詮釋與莊子的精神更有相容性。不管我們對玄學做如何的詮釋,有一個常識性的認識是無法改變的,也就是最足以代表魏晉士風的名士風度,其表現是以莊子精神為楷模的。然而湯先生的詮釋之最大弱點也就在這裏,因為他是從一種「實體形上學」的脈絡來理解所謂的「有無」,這就很難和莊子的實踐精神連接上。從實體形上學詮釋不出這樣的一種實踐上的特色,但是牟先生的詮釋是可以很容易跨越這個藩籬的。我常覺得,今天的主流玄學界對牟先生的詮釋,常有一種奇怪的排斥,這真的是一件很可怪的事情。明明魏晉士風就擺在那裏,而湯先生的系統就是聯繫不上這種士風,為何主流玄學界就仍然還是死抱著湯先生的系統不放?我真的搞不懂!

湯先生的系統我們就不說了。基於上述原因,我還是希望把玄學詮釋的焦點拉回到牟先生的系統上。當然,如我上面所說,牟先生只是更動了湯先生對有無的本體論詮釋,其他所有的話語系統其實都承襲於湯先生。換言之,牟先生同樣也把整個詮釋建立在王弼身上,因此他也就必須處理如何在王弼與莊子思想之間建立聯繫的問題。牟先生這個處理,基本憑藉的是王弼的《老子注》。我們前面說牟先生把有無放在一套所謂的「境界形態形上學」來說,就是在牟先生討論王弼《老子注》中完成的。當然,如果無真的可以從這樣的方式來詮釋,則這樣說的無執無為就可以很容易跟莊子所說的「無待」逍遙聯繫起來,並且也跟魏晉士風構成了思想上的接軌,這說服力自然會很強。然而,如果曾經仔細讀過《才性與玄理》的人,也許會注意到,牟先生對王弼《老子注》第一章的詮釋,其實和王弼的語脈並不一致5。這會不會產生重大系統性的影響,當然值得關注,不過對此處我想說明的事情,直接關係並不大,此處就暫時跳過。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則是由王弼的《周易注》所帶來的。王弼的這兩個 註解都是極為有名的,他的《周易注》成為孔穎達《五經正義》的《周易》註解, 他的《老子注》也是歷來所認為《老子》的最佳註本。這兩個註解寫成的時間只差 一年,照理說支持這兩個註解背後的思想也應該是一貫的,但是《周易》與《老 子》這兩本書在歷來的學術譜系中,差距又太大,這裏就不免會有一些啟人疑竇 的地方。難道王弼有可能依據道家思想來註解《老子》,又同時依照儒家思想來註 解《周易》嗎?對於這個麻煩的問題,前人的解決方式是認為王弼用「援老入易」

⁵ 同前註,頁128-139。

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也就是說,王弼其實是以其對老子思想的理解來註解整部《周易》。這個意思很明白,亦即王弼在這兩部註解中的思想還是一貫的,只是是由道家思想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援老入易的講法也是歷史悠久了,後來無論是湯先生還是牟先生,也都繼續沿用這樣的說法來解決這個尷尬的問題。但是「援老入易」具體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呢?在王弼的《周易注》中究竟是怎麼操作的,則似乎並沒有誰真正加以研究。即使是牟先生,對這個問題也沒有一個系統性的處理。在牟先生的詮釋中,也只是以舉例說明的方式,從王弼的註解中,找出了幾個看起來很像是援用道家思想來解釋《易》卦的例子。可是如果說,王弼真的是採用援老入易的方式來詮釋《易經》,那麼似乎就不應該只是採用幾個例子而已,它更應該是個普遍性的詮釋原則。但是王弼的《周易注》真是這樣運作的嗎?

坦白說,這真的是處理魏晉玄學時最麻煩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兩部註解的思想統一起來,則玄學的詮釋系統必將從頭開始就會留下一個巨大的疑問。這不是王弼留給我們的難題,而是當我們選擇王弼作為玄學的開創者,也是玄學論題的設定者時,就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它也必將會產生一連串的連鎖效應,甚至有可能讓整個詮釋系統為之崩潰。如果我們真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那麼就應該可以了解我即將要說明的,戴老師在玄學詮釋方面所做的努力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需要說明的,就是王弼的《周易注》如一般所了解的,它在基本形式上主要是回歸於先秦《易傳》的解經脈絡。我們常說王弼的掃象,這並不是說王弼不重視《易》卦的卦象。解卦就是必須根據卦象來做意義的推衍,這是從先秦的解《易》脈絡所傳下來的,王弼當然也還在同樣的脈絡中。因此他的掃象,只是說他很少使用從西漢開始傳下來的種種取象的新手法,而是直接跳過兩漢,銜接到先秦的〈彖傳〉、〈象傳〉、〈文言〉、〈繫辭〉上去。如果我們仔細對比一下,就會發現他其實在多數地方,根本就是沿用了《易傳》原來對每個卦的解讀模式;即使有些地方他的確有些新的解釋,但其整體的解卦形式與《易傳》基本是沒有差別的。說明這點,是希望讓我們了解,在如此的解卦模式下,想要去證實王弼的援老入易,恐怕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相信,戴老師對這些問題一定都是考慮再三的,而他沒有畏難,還是直面了這個問題,並且以很雄辯的方式,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以下我想用概括的方式簡單介紹一下戴老師對這個問題的基本想法。這個概括轉引自拙作〈中國玄學的重新

分期〉:

在戴教授的文章中,為了證實王弼在《周易注》中確實有著一些玄思以為主 導原則,他舉了不少例子,這些例子大體是放在「明無必因於有,全有必 反於無」這一原則之下的,根據這一原則,老師列舉了「無陽而陽以之成、 無陰而陰以之生、無應而應以之大、無知而知以之明」這四個綱目,來具體 表現王弼的玄思。老師說這樣的理解模式,主要來自於韓康伯《周易繫辭傳 註》的「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 不可為象。必有之用極,而無之功顯,故至乎神無方而易無體,而道可見 矣。故窮變以盡神,因神以明道,陰陽雖殊,無一以待之。在陰為無陰,陰 以之生;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當然這段話雖非王弼 所說,但王弼的確應該不會反對,然而問題是上列的四個綱目以及依照這些 綱目所舉的例證,真可以視為是對韓康伯「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原則的 詮釋嗎?照老師所舉之例來看,所謂「無陽而陽以之成」乃意味著卦爻之或 處下位,或處陰位,皆是謙德之表現,陽爻雖然處在不當位的狀況下,卻可 以藉著謙德之顯以成就。所謂「無陰而陰以之生」也是一樣,乃是說無論陰 爻是否當位,只要能以「以柔克剛」這種精神來尋求自我超越,也可以有所 成就。所謂「無應而應以之大」則是表示陰陽爻即使處在無應的狀態下,也 就是說即使沒有相呼應、相輔佐的力量,只要能自我超越,而不為困境所 限,一樣能有所成就,也就是無應之應是為大應的意思。而所謂「無知而知 以之明」這一綱目,老師則是以〈蒙卦〉為例,不過此例並不是將之作為一 個解釋卦爻位應的原則,而是對之進行一種義理式的發揮。也就是說,王弼 只是表示要用「藏明」的方式,去掉一切智巧,才能真正成就智慧。6

也就是說,戴老師認為,王弼把道家的玄智轉化為四個解卦的基本原則。照這說法,王弼並不是以直接將道家思想代入易卦解釋的方式來進行援老入易的工作,這點是戴老師與其他人極大的不同所在。因為如果要在王弼的《周易注》中找出直接引入道家思想的例子,是很困難的,最了不起就是反覆申說〈復卦〉、〈謙卦〉等幾個少數的例子;而如果只是憑藉著這樣幾個例子,根本就無法證實援老入易可以是王弼詮釋《易經》的一個原則。因此,戴老師以另闢蹊徑的方式,將道家的玄

⁶ 謝大寧:〈中國玄學的重新分期〉,《南國學術》第9卷第1期(2019年1月),頁60-61。

智移形換位,變成為幾個解卦的原則,這樣就有可能變成為一個具有全面意義的原則了。這個時候,我們不必費心在王弼的註解中尋找道家思想的痕跡,這樣的理解方式當然要比之前所有對此問題的處理,更有說服力。因為我們真的很難在王弼的《周易注》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例子,以證明他的確是運用道家思想來解《易》。因此,如果戴老師這樣的理解方式真能成功,那的確會為玄學解決一個千古難題。

我必須說,戴老師的努力可以說是玄學界這麼多年來最重要的發展。幾十年來,玄學界大部分都在做不斷重複的工作,而且多半只是在重複湯先生的系統,但對於玄學的真正難題,卻幾乎一個都沒解決。更何況是像王弼《周易注》這樣一個根源性的難題,就更沒人理會了。戴老師可以不畏艱難地嘗試為解決這個問題,投入如此心力,而且是以如此具有創意的方式,來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真的是非常令人敬佩。即此一點,老師就無愧為一大家!

以上我大致勾勒了戴老師處理這個問題的脈絡,也呈顯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我說這並不是王弼留給我們的問題,而是當我們非得把玄學創始者的封號加給王弼 時,這個問題便會對我們構成重大困擾。牟先生為解決湯先生的難題,提出了「境 界形態形上學」的創造性說法,讓以王弼為首的玄學得到了與以莊子為宗的魏晉士 風相勾連的可能性。在這基礎上,戴老師也以上述這樣具有創意的說法,來試圖證 實王弼的確是援老入易。這兩種努力其實都是為湯先生的典範鋪平道路的做法,雖 然在這樣的過程中,也的確修正了湯先生系統的核心基礎,放棄了他的「本體論」 典範的說法。但無論如何,如果這樣的修正都是成功的,那麼至少會保住湯先生為 玄學提供的整套話語系統。這當然也是重要貢獻。

如果從敘述戴老師對玄學的貢獻這點著眼,我的敘述也許到這個地方就應該 嘎然收住了,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再多說一點,也就是我對戴老師此一說法的進一步 看法。這麼些年來,我與老師的互動一直是如此的,我從來不是個乖學生,總喜歡 給老師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老師也總是能欣然接受。對老師的寬容,我是深有感 觸的。而對老師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新判斷,我也的確有一些看法。簡單說,我覺 得老師的做法還是很難說服我,讓我同意王弼的確就是如此將道家思想引入《周易 注》的。在上引的同一篇拙作中,我如此說:

綜觀戴教授所舉的這些例子,前三個綱目比較接近解卦的原則,第四個綱目則是在解卦之後對卦象義理的發揮,遠離此處所討論的主題,故始置勿論。 而就前三個綱目來看,則有三個問題需要弄清:一是這些解卦的原則是一個 具有普遍性,而且貫通於整個《周易注》的原則嗎?二是王弼並沒有明講這些例子正是「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這個原則的發揮,這祇是戴教授的詮釋,但說陰陽爻祇要處於不當位或無所應的狀況下,而能有所自我節制或是自我超越,便是所謂的「在陽而無陽」原則的展示,也就是全有必反於無之原則的體現,這樣的詮釋會不會太過寬泛了?三是如果說這樣的詮釋乃是恰當的,那歷來對卦象的解釋,從〈象傳〉、〈象傳〉開始,有多少解釋不含著「玄思」呢?

韓康伯所謂的「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的確可以視為一種哲學觀點的展 現,但他未必有意將這一觀點當成一個解卦的原則。而今天戴教授認為,其 中含著王弼解卦的原則,並且以之為其玄思的系統性展現方式,這樣的說 法所遭遇的第一個挑戰,便是這一原則的不具普遍性。我們無疑可以找出許 多例子,它們並不適用於此一原則。當然贊同者也可以辯說,這並不一定要 把它當作一個普遍原則,王弼解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則啊!可是,若王弼 真可以有很多原則,那豈不又是所謂的雜揉攙合了嗎?或者再退一步說,這 個原則雖非普遍原則,但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在這一原則上,王弼 表現了他會通儒道的努力,至於其他的原則,那祇是繼承於《易傳》的東西 而已。可是,若真是如此,王弼就不能說是在全面地會通儒道,這樣不還是 等於他在雜揉攙合嗎?再者,我也擔心我們可以依據這樣的詮釋方式,而說 〈象傳〉、〈彖傳〉在會通儒道。例如,《易經・坤卦》〈文言〉說「坤至柔而 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這話是不是並不需要王弼來解釋,它本身就已經含 著對「柔的一種超越,一步轉化,是在陰為無陰」了呢?〈蒙卦〉六五〈象 傳〉說:「童蒙之吉,順以巽也。」這也是一個陰爻而處陽位的例子,所以 也是不當位,而〈象傳〉說它是吉,因為順以巽,那可不可以說這也是柔 得尊位,而能以順以巽的方式自我超越,故能得吉呢?若是如此的話,那 就真的到處都有玄思在了。如此一來,這樣的詮釋不就失去意義了嗎?而 且,所謂的玄思究竟何指呢?祇要是陽不居首,謙德處下,便是玄思嗎?如 果玄思是以「無」為準,則陽不居首、謙德處下之「無」是一種什麼意義 之「無」?這會不會成為裴頠將〈損〉、〈艮〉、〈謙〉、〈節〉等卦比配到老 子靜一之義的同樣思路呢?這樣說的「無」當然也不是說不通,但它的意思 便已經不是一個究竟是從湯用彤的系統上說的 (無是一個本體),還是牟宗

三系統上說的 (無是一種作用上的去執,以及由此去執工夫所呈現的某種境界) 存有論概念。也就是說,這樣的「無」將不再有系統性的意義,它祗是一個純就工夫上而說的原則,而這個原則是不必帶著家派色彩的。我們不能說一談到「謙虚」等等實踐工夫,便說它是儒家的概念,因為家派的決定因素不在此也。然則在這麼寬泛的意指之下,而說這裏面含著王弼的玄思,這句話的意義會不會也變得完全模糊了呢?由於我們是在王弼為了會通儒道這一認知下,而說他引入了「無」這個概念,以在《周易注》中表現道家的玄思;但是,如果這個所謂玄思的內涵,根本不必與道家構成必然的聯繫,那不就成了論題上的自我否定了嗎?我很擔心的是,在韓康伯說「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這話時,它還能保留其存有論的色彩——雖說這色彩是不是屬於道家的還可以存疑,但經過戴教授將之詮釋為四個綱目後,這存有論的意義便走失掉了,而走失了這一層的意義之後,再來談王弼以道家的立場解《易》,恐怕也將成為一個不甚具有意義的判斷。

戴教授的一個基本判斷,是王弼以「有無本末」的方式,作成了他援老入 易的方法論原則,經此轉換後,《易經》義理乃從儒家易轉成了道家易。但 是根據上述討論,恐怕不得不質疑這樣的判斷,因為戴教授所舉的例子,並 無法支持作出如上的判斷。再者,如果說王弼是以「自然無為」為本,以儒 家的實踐體會為末,這裏所說的「自然無為」當然就是指的上說的四個綱目 了,可如果這四個綱目就是自然無為的話,這「自然無為」就將不再具有決 定王弼之為道家之系統的意義,它與那些諸如「謙虚」等等實踐法則乃是同 質同層的概念,因此它也不會是「本」。另外,韓康伯那段話其實就是一個 存有論觀點,而未必是一個方法論觀點。從這個存有論觀點可不可能發展 出一個方法論的觀點?如何發展?這都可以討論,但無論如何,它並不是 從「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這個存有論命題直接可以轉成「無陽而陽以 之成」的方法論命題的,若沒有注意到這點,便可能混淆了「本末」、「有 無」、「有末無本」這幾個概念之間的分際。也就是說,我雖然非常佩服戴 教授能以如此曲折而有創意的方式,來為王弼「援老入易」以會通儒道建立 一套理論體系,但是我仍然覺得這似乎仍不足以真正解決此一問題。因此, 我仍然強烈地懷疑王弼註《易》有所謂嚴格意義下的「援老入易」。然則,

如果建立不起來嚴格意義上的接老入易,那在哲學上會產生什麼後果呢?⁷ 簡單說,我認為戴老師這樣的說法,既會讓玄思的概念變成一個氾濫而沒有歸趨的 概念,喪失了作為道家思想核心的意義,而且也會產生一個奇特的效果,就是原來 從《易傳》開始,就已經無處不存在著玄思了,這對整個《易》學恐怕會構成顛覆 性的效果,也許陳鼓應先生會很喜歡吧!

對於這樣的問題,當然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不過就我此次的任務而言,再多說可能就有些離題了。總之,無論如何,我都必須說,牟先生對湯先生的系統提出了最重要的修正,而戴老師則根據牟先生奠定的基礎,做出了最重要的推展。應該這麼說,無論戴老師的說法我是否贊成,我都認為戴老師乃是這四十年來在玄學詮釋上做出了最重要貢獻的人。只有他沒有去炒冷飯,而是真正凸顯了一個玄學中的關鍵問題。如果學術總是在各種嘗試中艱難前行,那我們都該感念戴老師對此一問題的推進。王弼的難題是玄學中最關鍵性的難題,唯有真正解決了這個難題,玄學才有再度往前的可能。這是我在追思戴老師的玄學研究業績時,最深的一個感觸!

⁷ 同前註,頁61-62。